

桂冠新知叢書

文化批判 人類學

一個正在實驗的人文科學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作者 喬治·馬庫斯 George E. Marcus

麥可·費雪 Michael M. Fischer

譯者 林徐達



如果你喜歡薩伊德的《東方主義》，那你就不能錯過本書。
不管是人類學、社會學還是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都因本書的出版而有著革命性的轉變。

文化批判人類學——

一個正在實驗的人文科學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著 —— 喬治·馬庫斯 (George E. Marcus)
—— 麥可·費雪 (Michael M. Fischer)
譯 —— 林徐達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批判人類學：一個正在實驗的人文科學／喬治·馬庫斯 (George E. Marcus)、麥可·費雪 (Michael M. Fischer) 著；林徐達譯 -- 初版. -- 台北縣：桂冠，2004 [民93]

面；公分.-

譯自：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730-453-2 (平裝)

1. 文化人類學 -論文, 講詞等

541.307

93003317

08614

文化批判人類學：一個正在實驗的人文科學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著者——喬治·馬庫斯 (George E. Marcus) 麥可·費雪 (Michael M. Fischer)
譯者——林徐達
責任編輯——張慧芝、陳妍利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 231 新店市中正路 542-3 號 2F
電話——02-22193338 02-23631407
購書專線——02-22190778
傳真——02-22182859~60
郵政劃撥——0104579-2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廠——海王印刷廠
裝訂廠——欣亞裝訂公司
初版一刷——2004 年 4 月
網址——www.laureate.com.tw
E-mail——laureate@laureate.com.tw

©1986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nese Copyright ©2004 by Laureate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730-453-2

定價 —— 新台幣 250 元

台灣版前言

《文化批判人類學》之計劃：過去和未來 馬庫斯

《文化批判人類學》一書是 1980 年代對於當時社會和文化詮釋的幾個批判潮流中的一環。當時在人類學裡，有幾項關於跨人類學以及其他諸如文學研究、哲學，以及歷史等學科間藩籬的行動——譬如，《文化人類學》期刊的開創——這種交換的觀點總是帶有一種強烈、卻尚未充分發展的傾向，或許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同樣在 1986 年所出版的《文化的寫作》（*Writing Culture*）一書。在這些跨學科的交換觀點中，特別重要的是關於女性主義、解構、電影和媒體研究、批判文化研究、科學研究等新式跨學科的大環境，以及利用新的思維作為對比，以修正傳統區域研究的努力。於是許多在 1980 年代以一般性的方式來加以理論化的新問題，都在 1990 年代的新式調查方法和研究策略中，獲得非常具體的內容。在 1990 年代的今天，再次閱讀《文化批判人類學》，極有助於對以下四個議題的審思。

一、文化批判的本質：「批判」（critique）此一觀念（以對立於評論〔criticism〕）起源自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其致力於概

念的澄清，以及評價邏輯性和有效度間的關係。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寰宇性應用的學習已不再是追求可靠且實用概念下所必需、甚至慣用的特色。的確，在人類學作為文化過程的比較研究裡，其中一項持續的貢獻便是去堅持知識的生產及其多樣性內容二者間的關係。就像是幾何學一般——在歐幾里德幾何學尚未被開展出來前的時代裡，總是經常被想成是寰宇性的理性範式，並且將之作爲是親屬制度或是分娩等概念，或是有關時間、空間，或是人生觀概念下的一項實際操作。

「文化批判」就像《文化批判人類學》裡所運用的那樣，所指涉的不只是知識有效性的情況而已，並且是一種直接去評估社會和文化實踐的調查方法。我們從 1930 年代中舉出了三個影響 1970 和 80 年代文化批判的風格：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早期、超現實主義及其法國人類學聯盟，以及美國大蕭條時代的文獻寫實主義。

90 年代，文化批判面臨了新的挑戰，大規模人口統計學上的改變，使得文化意義上「單一同質性國家」的想法受到挑戰；另外，還包括跨國際通訊以及視覺媒體的新形式出現等因素。即使頗富爭議，目前這種新形式在理性和認知模式的轉換上，正如先前由口述形式轉換成讀寫形式那樣深具潛力。這類新挑戰尚包含以提供新技術來影響大眾的新科技，正如我們在此一世界中的行動方式所賦予的一種新概念和隱喻那樣。而對人類學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條件都需要調查和書寫的新形式，以便於應付這世界上的各種新演員和過程。然而我們絕不能就此輕易地向傳統的道德箴言或是政治評估的意識形態低頭，文化批判的新形式必須融入至日以俱增的專門知識和旨趣的協調中。傳統侷限於單一學者，並試圖以清晰的學術語言和個人權限的方式所書寫的民族誌，或將逐漸地屈服在目標明確的合作計劃上，即便該種計劃在當代人類學以及相關的學術訓練裡尚未尋得定位或是承認。在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80 年代，我們將這種跨學科合作和對話式書寫的方式介紹給不同的讀者群。但美中不足的是，這些合作計劃裡的研究課題，並非是一個在傳統田野工作實踐下所描述的那種豐富的民族誌，而是一個令所有合作者——報導人、專家們，以及民族誌作者和文化譯者——都感到難以理解的活動領域。

在一個民族誌計劃裡的各個活動團體中，不管是重覆還是不同的知識旨趣，此一事實都需要結合這種新研究條件下的人類學家們，並且這種新的研究條件，不再是馬凌諾斯基式或是鮑亞士式專家們的研究特質，抑或是最近頗為流行的「他者」理論所可以做到的。在這種新的研究條件下的合作者，已不再像是傳統模式底下的報導人，也不像是該人類學家計劃裡完全的夥伴。但至少他們相當於人類學家的社會位置。並且若欲挑出這種同等性說法中的異同之處，無異是去建構當代民族誌中合作計劃裡的運作關鍵。

是故，人類學計劃不再是對新世界的簡單發現，像是將奇風異俗翻譯成熟悉的事物，或是將奇風異俗給予去熟悉化而已，這個世界的發現已逐漸不為任何人所熟悉或理解，而是所有的新發現都正在尋求解答。舉例來說，這類的計劃涉及了全球化過程中的在地效應，尤其是當我們不再堅持「現代化和歷史力量現在正利用此一效應，給予任何地點一個極為相似的新定義」此種前提，並且如果我們注意到冷戰結束的同時，也同樣是兩極對立論點，或是三個世界這種簡易分類方式的結束。或許伴隨著所謂的「全球化」，會出現另一種另類突現的現代化，而探究人類學裡鮮為人知的民族調查，正是延續當前研究批判的有效前提。

二、「回返」到文化批判人類學的多種方法和定位：在 1980 年代，我們主張人類學為了實現它自 1920 年代以來，作為世界上的文化和社會的比較研究此一承諾，需要「回返」其自身來研究自己的社會，就如同比較「其他」社會那樣地細微和嚴厲。在

1990 年代，「回返」此一觀念已經逐漸變得太過單純與二元化，其中在社會和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最為有趣的地方皆是跨地方性且跨文化的操作方式。在 1980 年代，我們亦主張許多不同「多重田野場域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形成，即便該想法對於個人式民族誌作者而言，並非總是具備其操作的可能性，以作為是在田野工作上的一項策略，但是「多重田野地點民族誌」作為一項在概念上的架構，將會逐漸地成為必需。我們所以為的「多重田野場域」（“*multi-sited*”），其意義是超過文化差異的系統性研究——這麼說吧，譬如同樣的宗教，其意義會隨著從村落轉換到鄉鎮、都市的環境，或猶太移民的文化變遷，或商品的「社會興衰史」來轉換。我們也在意研究過程的困難度；舉例來說，南非社會的流動性黑人技術官員（*technocrats*），其意見足以影響約翰尼斯堡南方索威托城（Soweto）的勞工階級，但其所指涉之世界和專門知識，卻只是間接地對應了這些黑人勞工階級的經驗世界。於是「多重田野場域」計劃就可因此轉換於無差異的階層關係上（*incommensurability*）執行，並得作進一步的研究，使計劃的目的能更清晰地表現出來。「多重田野場域」計劃或許可以表現地更好——原先引以為傲的結果，其實在擺脫道德壓力的面向上是無能為力的，就像一個人（無論他位於該體系的哪一層面）對於其生存環境的各種議題，除非他可以切斷所有與金融經濟有關的聯繫，否則他根本無法避免問題的出現。這種種的關聯，都使得各種民族誌計劃都形構成一個整體，提供了各種有趣的可能性來具體擴大民族誌分析的領域，然而，它所付出的代價則是「偏袒」（“*taking sides*”）了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在民族誌歷史中成為常見的議題。我們所主張的觀點在 1990 年代獲得了大家的注目，作為一互動複雜的「田野工作」網絡中，人類學家與他者，也就是那些在傳統論述中被置於對照組的被報導人，當人類學家回溯其文化力量和改變中的社會壓力等

網絡、變化、影響等連結時，與他者雖在共同地理解上感到興趣，但其中卻夾藏著不同的旨趣和風格。在 1980 年代，則是有關新的文類和寫作風格等實驗性議題，這包括了所謂的「共同合作」、「對話」等。如今可以確定的是，早期所強調的重點，預示了當今定義田野工作和研究策略的基準規範時所依循議論的方向。

三、「再現之危機」的艱難：「文化批判人類學」此一文化效應之崛起。作為一門擁有優越的實驗價值以及深度保守的底基的學術訓練。部分人類學家已開始反抗「再現之危機」此一想法，無論此一「再現」反映了保存舊有概念的適當性，或甚至反映了其具有創造一新的客觀描述框架的信心。皆部份來自於對人類學深厚知識的堅持，迥異於衆多人類學家在有關民族誌議題的文化研究中所感受的膚淺性（superficialities），特別是受惑於過去對敘說和再現等框架的極端批判。不過，在許多工具實踐（*instrumental practice*）的領域（法律、科學、政治經濟），這種持續讓基礎知識處於不穩定的狀態——確實是當代民族誌的一項核心且特殊的事實。這些領域內的領導者經由真實的全球事件，正首次體驗到傳統和新方法間的連接，已讓研究者逐漸跳脫了往昔的窠臼。也正是這些領導者，得以對應晚期現代性所突顯的新世界，成為人類學家的同僚，或是與持著不同目標，但卻因此一正在進行的高複雜度社會和文化互動變遷，而感到好奇或迷惑的人彼此共事。

在這些人中，對於民族誌所運用的方法感到特別有興趣的，包括非人類學家——譬如工程師或是建築師這類更需要了解使用者的人——以及主張那些科學哲學家在實證層面上是幼稚或是錯誤的科學社會學家、法律批判學者或公共健康專家等，則是有興趣於這些機構是如何實際運作和影響其生活，或是去探究調查知識領域內各種議題的記者在內。眼看著自身所考量的方法和概念

被輕易地拿來挪用，部分人類學家感到並不舒服。（譬如，文學研究最近就挪用了人類學家對文化的概念，甚至是民族誌對此一觀念的實踐。）然而，在資訊蓬勃的今天，各種訊息對學術訓練所造成的重新配置，正給予了人類學大量的收穫，吸收汲取了這些精華，無異是給予了傳統民族誌在新環境中的系統性再製工程一項新線索。

更普遍地說，我們漸漸地發現了論點的有利條件——批判人類學承認了人類學的操作方式，已不再是像十五世紀的探險家那樣，尋找著「發現新世界」的理想典型。相反地，我們步入了新聞工作者、早期人類學家、歷史學家、文字創作者以及當然包括這些研究主體自身等所已提出的再現模式。因此，任何民族誌的主要架構工作，就是去並置這些早已存在的再現方式，以企圖去理解其生產物的多樣條件，並且將其結論分析合併融入至當代田野工作計劃的定義策略之中。就某種意義來說，正是這種將現存社會事實的再現領域融合至人類學的民族誌實踐之需求，激勵了民族誌在各種地點的研究領域，並成為一種新的基準；以確認田野工作與傳統核心間兩者的關係。

我們在 1980 年代所論辯的寫作種類和模態的實驗性，並非只是去重振第一代現代人類學所早已完成的事業，而是企圖就民族誌實踐中，對於新形式實驗此一價值的恢復。寫作的新模態喚起了知識論的議題，直接涉及到研究的思考方式，以及知識是如何從中得以顯露出來；並且也促進了民族誌修辭的說服力，以作為再現的競爭體制下的溝通模態。舉例來說，經由電視和其他流行媒體對其他不同文化知識所提供的串聯，提高了支撐學術報導的精確標準，並且甚至改變了人類學在推論自身社會上的空間與功能，或多或少地遠離了那種作為不同人種間文化差異的詮釋者，所輕易建立並被認明的權威式角色。人類學維持了此種傳統功能，如今也明確地在極度複雜化的批判前提下操作著——相同的

功能下仍存在著許多實踐上的差異；並且，這些差異會在當代任何人類學家所選擇的民族誌研究課題裡被發現。

四、從人類學知識孕育的新政治學：在 1980 年代中期，從過去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和基礎知識開啓了兩項非常顯著的挑戰——愛德華・薩伊將人類學歸類為一種「東方主義」的形式，以及德瑞克・夫瑞曼對瑪格麗特・米德的田野工作及其對著名薩摩亞詮釋等準確度的質疑。我們運用這些挑戰來烘托人類學內部的批判，並認為某些新趨勢已相當具創意地向人類學提出挑戰。事實上 1980 年代是多重詮釋的全盛時期，包括了當前的女性主義、後殖民研究、媒體研究、文化研究、以及科學研究等，都開始試圖「詮釋」自身的特性。在這些學科領域之中，人類學的位置扮演著夥伴、借用者，以及教師的角色。

此處值得去考量人類學及其批判調查的民族誌方法被非人類學家所借用和改造的程度。科學研究領域正是一個首要的例子。這不只是因為人類學家曾經在其著作中貢獻至該領域，並且是因為研究科學和科技的歷史學家找到人類學的概念和方法來作為其自身研究的闡釋和操作工具。

後殖民研究包括幾項思想潮流，其中一項延續或修正了愛德華・薩伊的思想〔譬如，蓋雅翠・斯匹弗克（Gayatri Spivak）朝向更德希達和女性主義的方向；荷米・巴巴（Homi Bhabha）則朝向更具心理分析的方向〕，其他人則是直接地根植在〔由拉納吉・古哈（Ranajit Guha）所領導之次文化研究歷史學家們〕對印度次大陸的歷史資料再分析。這些對後殖民研究的興趣，包括了各種後殖民社會，從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筆下的愛爾蘭到對非洲和部分亞洲國家的分析。也有部份根植於印度次大陸，並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和其他區域間的關聯性。譬如對中國學者來說，該研究對中國自身歷史和文化提供了新的批判觀點。就像早期的附屬國理論一樣——其中以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奧

斯曼土耳其最為適用——該理論之創始在全球或是世界歷史之輸入上，都具備寰宇化和本土化的意義。確實，民族誌在當地的深層知識及其在全球互動的過程中，確實證明了人類學在現代化的討論中，是一位重要的貢獻者，它在致力於重建下一世紀區域研究機構的過程中，也有切題性的關係。

至於人類學為何對文化變遷等話語造成如許壓力，繫於底下之事實——那些當初曾經迴避將人類學視為是開拓殖民地訓練的非洲大學，如今正在建立人類學科系，不僅表達了發展中的實際議題，同時更是有關文化形式和都會生活的概念性議題。對人類學家，第一世界的社會也同樣真實地具備潛力，他們可以去扮演鍛造科學和科技等公共討論之角色，該角色——特別是醫學人類學所曾經扮演的——如今已經擴大到其他活動場域。這是因為社區主體作為公共議題所承擔之風險的緊急性、工業污染或是核電等風險、或是由新醫學科技以一種對立之位置來重新定義身體和生命，或是正在進行中的環境對其生命世界之影響。

於是，當今正在進行的民族誌研究已經失去一個「發現世界上民族的文化差異並為之權威性代言」的傳統且顯著的功能——假使這並非是一項專斷的特色——此一事實並非像是長期以來所預料並且所害怕的那樣，成為人類學一項警訊或是破壞性事件。我們能夠看見的是，知識上的政治型態自 19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轉變，諸如《文化批判人類學》以及《文化的書寫》這類書籍的出現所引為標誌的，事實上已經為長期以來人類學自身所需要的革新，展現了許多新的機會。其中有些顯然已在過去十年來成果輝煌，其他則是尙待探索與討論。不管這些機會是否需要依賴人類學家的勇氣、獨創性及其開放度，以建立其自身在權限授權上的新形式，這些機會與其他相關的學科訓練和知識領域的重新配置正似乎要啓動。它們將會仰賴民族誌所實踐的新規範和調整式典範間的連結，而在此一連結下，合作和對話不單只是民族誌寫

作的理論和感想，也並非赤裸裸地揭露過去人類學家所一直在進行的研究方式，而是成為新的研究景觀、議程以及人類學家所展示的新研究課題關係下的出發點。

英文版原序

在美國等地，最近數十年正目睹一場意義深遠的挑戰，這是對於自十九世紀晚期以來，企圖將社會科學引導成為專業學術的理論目的與風格的挑戰。對徹底變革中的世界秩序的廣泛察覺，助長了這項挑戰，而它在描述社會現實方面，也挑戰了我們在手段運用上的信心，這是任何一種社會科學所植基的基礎。因此，在當代的任何領域裡，只要它的研究主體是社會，它就會嘗試以鮮明的全新方向來重新定位自己的學術領域，要不然便是建立完備的研究機構，致力於對理論的綜合性新挑戰。

這些論辯對西方的知識傳統來說並不新穎——事實上，它們是對冀望社會研究成為自然科學之期待的回應；這種期待被詮釋理論所挑戰，該理論堅稱人必須與自然受到不同的對待。但是在當前，這些論辯的歷史性表達經由獨特的政治、技術以及經濟事件的形塑之後，既是新鮮的，同時也揭露了當前的知識境況。就最廣泛的層面來說，當代的論辯是有關一個驟然顯現的後現代世界，如何在當代多樣的學術表現形式中，被再現（represented）為社會思想的客體。

如果當前知識趨勢的討論並不關心自身作為獨特的學術處境的話，這些討論可以是無足輕重，並且毫無說服力的。對我們來說，當代人類學的發展反映了在一個遽變的世界裡，再現社會現實所遭遇的核心問題。在人類學領域內，民族誌的田野工作和寫

作已經成了當前理論探討和革新最為活躍的場所。民族誌所關心的是描述的議題，並且致力於使民族誌的寫作，能對更廣泛的政治、歷史、哲學意涵有更高的敏感度，促使人類學得以置身於當代再現社會論述的問題論辯旋渦中。我們堅信，對社會文化人類學裡所稱呼的「實驗時刻」（experiment moment），所作的探討也同樣揭露了許多有關此一普遍知識的趨勢。

所以本書在實質上是一項對釐清當前社會文化人類學所作的努力。雖然本書包括了對過去著作的歷史回顧，但它卻沒有打算成為一部人類學史。本書同時也援引了許多我們同事的著作，但並沒有意圖再作一次完整書目的審視。在此，我們對那些未能引用之作者感到歉意，同時希望獲得那些我們所引用之作者的寬容。

我們將會聚焦在美國人類學的發展上，但是在許多的內容上，也同樣可以適用於英國的人類學界，或者是更廣泛的範圍。在 1950、1960 年代期間，英國人類學界透過研究範式（research paradigm），作出了比美國人類學更具規律化的成果，它同時導出了一個異文化的民族誌，在描述和分析上應該要有更精確的觀念。這對美國人類學來說，具有很好的聲望以及影響力，而在各大研究所裡，這兩個傳統是合併在一起的。英國傳統在 1960 年代所延伸出來的生命力，正如當前在實驗時期所浮現出來的一樣。不過，今日影響的方向卻倒了過來：美國文化人類學的成果正導引著英國人類學研究努力的方向。同時，佔優勢的美國人類學傳統，也同時深深地被現代人類學的第三個主要傳統所影響，此即法國人類學。在這方面，有一些當代美國人類學著作中的實驗取向，對法國人類學家來說是不陌生的，就像是回憶兩次世界大戰的中間期裡，在法國所發生的一連串令人興奮的改革往事（Clifford, 1981）。因此，我們所聚焦的美國情境，反映出一種揉合了這三國傳統的歷史發展。

更甚者，這是一個逐步昇高的全球互賴意識，挑戰傳統學界裡涇渭分明的國家觀的時機。這些傳統至今仍微妙地保有其重要性，但是它們在運作上對交流（communication）和互動（interaction）的障礙卻日益減少了。至於其他如巴西、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以及其他國家的新興人類學，都正在從事一種混合當地所關心的議題與西方社會理論的古典議題間的發展（Gerholm and Hannerz, 1982）。這些具多元特色的人類學，首次開啓了人類學著作中跨多元文化讀者群的現實可能性，這終究會對美國和歐洲的人類學著作，產生構思與寫作方式上的深刻影響。

在與許多同事討論這本書的構想時，我們注意到一個持續的傾向，那就是欲將所有討論拉回到第一代現代田野工作者的古典著作中。相反地，本書的目的是協助鍛造一個有關當代以及未來著作的有用論述。或許挑剔的人會說，一些相類似的描述性陳述，早已被其他文化的先鋒作者，如伊凡一普里察德（E. E. Evans-Pritchard）、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鮑亞士（Franz Boas），或是倍蓼（Gregory Bateson）所說過，或是民族誌寫作實驗就跟人類學一樣老舊等等；但是，如果這類的詭辯不能聚焦於如何才能使我們做得更好的話，恐怕是沒什麼幫助的。而假使這類的言論無法引導我們在當代做出一較優秀的成果，那麼去責備先驅們的過錯，將是令人厭煩且軟弱無力的流行風尚。

重新閱讀和分析古典作品，確實是一項令人尊敬的人類學演練，它可以磨練我們的分析技能，並且經常因此引導出新的洞見。然而我們認為，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先驅們寫得好而已，事實上，許多我們的當代同事，對這些學科的過去已帶有一份敏銳的批判察覺力，做得已經比過去更為出色。更多的人已經撰寫一些極具有旨趣的主體論述，縱使這些作品經常帶有瑕疵。然而正是這種引人注目的挑釁（provocation）意味，我們才稱呼它為「實驗」（experiments），並且就瑕疵之處，請求讀者的寬容：瑕疵

經常是帶有知識趣味的問題的「記號」，這些問題代表了重新陳述古老問題以及提出新議題的一種努力。

對我們的學生以及讀者大眾來說，我們希望本書將使當代人類學寫作能夠少一點怪異的味道，並且能夠對適宜的新寫作文脈提出建議。而對我們的同事來說，我們希望能夠詳述一種至今仍懸而未決的論述。我們並不希望看見自己是在公佈一種宣言，或是去展望一種新方向；我們當然也絕無擁護某某「主義」或是某某「論」的意思。相反地，我們唯一的信念是將一個已經正在進行的「讀本」，提煉出一條討論今日民族誌的接受度和作品的途徑，使之成為一系列清楚陳述的議題。

所謂「正在進行中」對我們而言，似乎是一種孕育的時刻，這其中每一個別的民族誌研究和寫作計劃，都是一種潛在的實驗。整體來說，這些都是在重新建構人類學理論基石的過程中，藉由探索新的方式，來完成現代人類學植基於其上的承諾：提供對我們自身社會有價值且富趣意的批判；啓蒙我們自己有關人類的其他可能性，以產生一種覺知，了解到我們自身的社會只不過是許多模式中的一種罷了；著手於尚未檢驗的假設，藉以拿來運用於與異文化成員的接觸。人類學並非是一種對異地風俗的無心組合，而是運用文化豐富性以作為自我反思以及自我成長。在此一不同社會間逐漸相互依賴，以及不同文化間相互覺知的現代世界裡，欲完成上述觀點需要一種新的感受力與書寫風格。這種人類學的探索，有賴於將「異文化他者的描述」這種簡單的旨趣，轉移到更具協調性的文化批判上，即藉由異文化現實來對照我們自身的社會，以便對文化獲得更為適當的知識。

此一實驗時期具有一種折衷（eclecticism）、無權威式的研究範式①、對主體事物的批判和反思觀點、對實踐中多樣影響力

① 「研究範式」（“paradigm”）早已成為非常流行的概念。我們採取它現